

中國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主编：曹月堂

中州卷

主编：王树林

 湖北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WENHUA SHIJIA

中州卷

中國文化世家

任繼愈題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中州卷主编：王树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世家. 中州卷/王树林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51—3825—X

I. 中… II. 王… III. ①文化—名人—中国—古代
②文化—名人—河南省—古代 IV. K8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756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3 插页 24.25 印张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543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3825—X/G·3133

定价:43.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中国文化世家

ZHONGGUO WENHUA SHIJIA

学术顾问：任继愈 来新夏 戴文葆
主 编：曹月堂
副 主 编：舒 怀 何新文 葛金芳
常务编委：邓瑞全 陆才坚 黄 榕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王兆鹏	王树林	权儒学
刘重来	李才栋	吴 光	吴怀祺
何林夏	张 涛	周伟洲	毛远明
贺敬美	高增德	黄季耕	

选题策划：陆才坚 黄 榕
封面题字：任继愈

中州卷

主 编：王树林

家族制乃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基础之一，家族之传承关系历来颇为社会所重视，文献亦多有记载。1997年春夏之交，我于北京晤50年代之老学生曹君月堂，时曹君正策划主编《中国文化世家》，邀任顾问。情不可却，遂有所商榷而略贡刍蕘。是年冬，我复于一次会议得见南开大学校友臧恩钰，出其昆仲合著之家族史《边外炊烟》，请我作序。于是乃就世家一体，论述如次：

司马迁著《史记》立世家30卷，起吴大伯世家至三王世家。《索隐》解释世家的含义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其意乃指古代世袭爵位的贵族，或因政治上的优势而世代为官的家族历史。后世则含义日广，遂有“经学世家”、“中医世家”、“文化世家”以至“梨园世家”等，所记多为声名卓著家族之家世事功，而于一般平民家族，殊少及焉。其后虽有谱牒以世其家，而往往史料不足，语焉不详。遂使极为丰富之民情习

总序 ZONGXU

俗,家族传承均以无所附丽而渐次泯灭,使有关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失去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反之,若有家传之类,则凡人口之迁徙、地方之开发、风物人情之记述,皆能有所稽求而为中华文化更增异彩。

臧氏所作乃记其先世至今之艰辛创业,繁衍生息,令人具见一平民家族以一农家如何蔓延于教育、交通、医药、艺术各业之发展趋向。是以一家而辐射各业之家族史,属于世家文化之著述。月堂所论乃就文化一端而言,即所谓专论文化世家之一脉,二者似有所不同。月堂于其编纂纲要中曾对二者有明确界定云:“‘世家文化’与‘文化世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现象。‘世家文化’的重心在文化,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学上的构建;‘文化世家’的重心在世家,对它的研究偏重于文化传承的家族渊源。”

据此,月堂遂有编纂《中国文化世家》之议,将全国按文化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为中州、齐鲁、三晋、燕赵辽海、荆楚、吴越、江右、江淮、岭南、巴蜀、关陇等11个地区,各立一卷,共500余万字。乃邀集同好,分头运作,期以世纪之交成书。若此体大思精之宏篇巨制,设非月堂之殚精竭虑,诸君子之戮力同心,直若缘木而求鱼。今春月堂函告:《中国文化世家》近期将告杀青,并邀作序。窃惟月堂以积学之士,久羁卑位,郁郁不得申其志。我一介书生,无援手之力,徒唤负负。不意,月堂以花甲之年,奋蹄崛起,广集俊彦,发前贤之所未发,荟中华文化世家于一编。我不仅为学林增一宝藏贺,我更为月堂于晚年得展才智而生熠熠光辉贺,于是赠以“莫笑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句,并乐而为之序。

来新夏

2000年4月10日于南开大学遼谷

世家作为载史的体例,创于《史记》,但太史公没有对“世家”做严格的定义,似乎既强调了世家地位与影响的重要,也包含了家族、家世的意味。后来,世家是指世代为官的家族,即贵族势要之家,有门阀、世族之称。汉唐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演变,虽然世家大族始终以科举入仕为依归,但世家的含义已偏重于传世久远或家族兴旺了。文化世家,作为一个规范的名称不见于史书。人们习称的有经学世家、梨园世家等,强调的不是政治权势,而是文化的传承,即所谓家学渊源。

本书以文化世家为题,就是讲述自古以来对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甚或仅有一代两代之显的家庭。

前言

QIANYAN

文化世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学术课题。我们编写这部书,出自多方面的考虑:

其一,几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可以称得上文化世家的确是太多了。这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往往离不开家庭、家族的影响。事实上,即使专谈个人或作品,专谈某个时代的文化成就,只要稍作深入的分析或全面的叙述,就不能不涉及一个个家庭或家族,就像谈政治、经济,总会谈到家庭、家族一样。因为“家”毕竟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家的成员,更何况家族制度的久远和牢固更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仅此而言,对自古以来的文化世家,做一次全方位的搜索、发掘,做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和表彰,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二,历代“正史”是写帝王将相以及达官贵人的官书。官为本,政为本,而关于文化的载录只是附庸和点缀。与其说是保存了文化,毋宁说是湮没了文化。近代的学术专著,如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等,摆脱了官本位、政本位,却因作专题性的阐述或规律性的总结,无形中有着重流轻源,甚或以点代面的局限或缺憾。重点突出了,非重点的,实际上更具社会性的却被大面积忽略。学术史几乎仅为名人大家的累集。以至于多年来著述的更新,基本上都是点的深入或新探,少见有面的开拓。理论有翻新,基础却不见更宽更厚。本书即以文化世家为题,凡是称得上文化世家的都可收入,而不计其他条件,可举可叙者不啻千数之多。如此必将大大开拓可供研究的文化资源,不会是无益之劳。再者,清朝几百年和辛亥革命后的近半个世纪,是一段很值得总结又缺乏总结的历史。其文化方面尤其如此。本书以1949年为下限,整个清代包括了进去,20世纪的前半叶也包括了,而且

因为时间靠近和材料丰厚,在全书占有较多篇幅。这对中国通史或中国近代史也算是某种补缺吧!

其三,可以说,当前属于社会学的家族史尚缺乏研究,属于教育学的家学研究更似未见。近年来,谱牒学虽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但也尚在起步。对中国文化世家的搜索与研究,必会与这些学科相连接而相互促进。

其四,本书的编写,就是将“世家”纳入文化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中国文化遗产与发展方式上家庭、家族性的特征,并由此探讨文化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家庭、家族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这是历史的存在,而且依然存在于现实乃至今后。家庭、家族除了具有血缘和亲情的属性之外,更有社会属性,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连的。正如一定的社会制度对文化的发展既有负载、养育和促进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一样,家庭、家族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总结家教、家学以及世家风范的具体的积极的影响,更重在宏观上透视和探讨中国的家庭、家族制度与文化发展的多种关系。这样的切入探索,除了对数千年文化遗产的表彰和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文化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要之,《中国文化世家》作为一项专题性的表彰和总结,是独立的、完整的,是当做一部纪传体的中国文化世家通史来写的。对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理论性研究而言,也可说是先作了素材或文献资料的奠基。

三

本书按文化地理的区域类型分卷,包括中州(河南)、齐鲁(山东)、三晋(山西)、燕赵辽海(河北、京津、东北、内蒙)、荆楚(湖北、湖南)、吴越(苏南、浙江、上海)、江右(江西)、江淮(苏北、安徽)、岭

南(两广、云贵、港澳)、巴蜀(四川)、关陇(西北各省),共11卷,总字数约500万字。

全书由各分卷组成。每卷均由总序(前言)、分卷总论、正文三部分组成。世家条目按年代先后顺序编排。每个条目的内容包括:(1)人物生平;(2)文化成就;(3)家学传承的事例;(4)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

本书采取一般的传记体裁。行文以述为主,寓评于述,不作烦琐的考证与辨伪,不作空疏议论,力求平实。

本书的编选对象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两代及两代以上相传,或同代相翼相成,在本地域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有文化成就的世家,包括祖孙、父母子女、叔侄、兄弟、夫妻、舅甥等。选目的确定,以影响大、代表性强的世家为主,但不以“见于经传”为限。各世家从事的学术门类同异不论,但必须有著作或技艺传世(存佚不计)。入选人物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世家代表人物卒年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为限)。分卷按文化地域,每卷入选的世家必须属于该文化区域。对于那些因出生地、活动地或成名地有异而发生籍贯地域之争的世家(如朱熹、杜甫等),一律以该世家代表人物的出生地为准。

▼ 本书的资料来源包括正史、野史、方志、谱牒、碑铭、笔记、文集、序跋、书札、学案、专题资料汇编及有文字记载的民间传闻等。

四

100多人,历时4年终于把书写完。时间没白过,人也尽了力,我们心里感到充实。至于水平怎样,价值多高,终究应由读者、专家去说了。当然,我们对自己的成果也有一定的感知和评估。每位作者对自己的文章是如此,本人与各卷主编对全书或各自分卷也是如此。从总体上说,当初的设想,基本上实现了。

因地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卷的内容自有特点。比如江淮、吴越,明清两代文化世家最多最大,资料极丰富,于是多有大篇;江右文化则以宋代最盛,可写的条目很多而资料多有缺失,所以小篇较多。全书虽有统一的“编纂纲要”和“编写体例”,但文章毕竟是分头去写,水平、风格自难一致。

分卷主编主要负责条目的选录和内容的核实。本人作为总的主编,虽然最后审订了全稿,但也只能做取舍是否得当、体例是否规范的判定和一般性的订误。不仅是水平所限,也受方式、方法和时间的局限,全书的错误或缺漏一定不少。补充、修正,特别是总体的加工和质量的提高,只能留待今后的努力了。那不仅是主观上的再接再厉,客观上也有待于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和建议。现在似乎只能这样,而将来的修订,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11卷是11个编写单位。创意之初,就定下了当地人写当地世家的原则。我们不是同行间共同撰写一部教材类通史或一般论著。各自的专业虽然都与文献有关,但谈到中国文化世家,都是略知一二;就是所知的一二,也是耳熟而难详。于是,只能分头访察、分工撰写。最好也是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各彰本乡之贤。这除了情感与常识的所长之外,还有资料查访的方便。写众多的地方性世家必当如此,就是写世人皆知的世家,也需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料,最少也要翻检方志、谱牒。可以说,这是本书撰写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当然由此也带来了文风不一、水平难齐的多种局限。得失相较,我们把求实、求详放在了第一位。

本书创意,是在1996年之春。湖北大学的舒怀、何新文、王兆鹏、鲁毅、郭莹、葛金芳多位教授,都是我的朋友,是他们和我一起策划的。再者,创意之初得到了湖北教育出版社冯芳华、黄

榕、陆才坚诸位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继之，则是邓瑞全、王岗、王树林、何林夏、张涛等年轻朋友和黄季耕、李才栋、高增德、周伟洲、吴光、刘重来、毛远明诸位先生的热心加盟。《文献》杂志的权儒学、贺敬美是我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是我的挚友，他们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杭州大学束景南教授，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都以重友情、重学术的热心和风格帮助了我。来新夏、戴文葆两位师长是我的当然的学术顾问。任继愈先生，是师长又是领导，他的关心和鼓励自然坚定了我的心志。至于完成本书的主力，即上百位作者，他们既是各分卷主编的朋友，大家自然也成了事业上的朋友和同志。11卷，11支力量完全是靠友情与共同的事业心凝聚在一起的。当然，湖北教育出版社是最可靠的基地和后盾。陆才坚先生是责任编辑也是主持者，从创意策划、制定“编撰纲要”，到审订样稿、统揽全局，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还需告知的，是中国文化信息协会认同并支持了本书的出版。协会领导出自对发展文化事业的责任和热心，在本书和本书作者群体的基础上筹建了家族文化研究会。这为我们的继续前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和宝贵的机遇。大家既然都是主人或参与者，只应互祝互勉而不言谢意了。我只能代表大家向广大读者致意，热望得到广泛的关心、批评和督促，那才是最大的动力和鞭策。

曹月堂

2000年夏于北京后海淘淘居

中州是河南的代称。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见于《尚书·禹贡》，当时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即冀、青、徐、兖、扬、荆、豫、梁、雍。《禹贡》谓“荆、河惟豫”。《周礼·职方》、《尔雅·释地》说：“河南曰豫。”“荆”，指湖北南漳西之荆山；“河”，指黄河。河南是古时豫州的主要部分，所以今日的河南简称为“豫”。因豫州东有徐、青、扬三州，南有荆、梁二州，西有雍州，北有兖州和冀州，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州。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又曾用中国、中夏、中原为代称，后来随着这些名称内含的延扩，不再局限于河南一域，或指整个国家，或指黄河中下游数省，河南开始使用“中土”一词，或专用“中州”作为代称了。河南不管称中国、中夏、中原，或称中土、中州，其含意都是谓国之中央，因这里聚居着文明先进的华夏族，它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少数民族比较而言，蕴含着文明先进和民族优越的意义，它已不仅仅是一个

分

卷

总

论

FENJUAN
ZONGLUN

区域的概念了。一提到中州,人们就会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产生无限的神往,对我们祖先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引发无穷的追忆。本书就是一部论述上起先秦,下至近代,在河南这一特定区域内所产生的文化世家的著作。

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一出三门峡谷,就改变了她奔腾咆哮的狂傲的脾气,而变得舒缓、温柔而慈祥,她把大量从黄土高原上带来的肥沃而松软的泥土,覆盖在中原大地上,加上这里得天独厚的温润潮湿的气候条件,为我先人营造了温暖舒适的美好生存和发展环境,从而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中州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而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的农耕文明也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流域逐渐形成。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记述先古有道明君的仁德风范,无不称道他们在发展农业方面的贡献。“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周本纪》)三代时期,农业耕作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击壤歌》)。《诗经》中有不少篇章描写先民的劳动生活,如《芣苢》、《十亩之间》、《七月》等。特别是《七月》,描写了农民的全部劳动生活。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竞雄,政治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生存和发展,他们所进行的各种富国强民政策,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为列国所争相仿效,卫人商鞅的“耕战”政策使强秦奠定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中州作为农耕民族的发祥地,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征,他们对于农业的

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为守土重家,安于一地的思想观念,为世家大族的形成和文化世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中州是这种政治社会制度形成、发展、成熟和巩固的核心地域。宗法制度是在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由于阶级的产生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由于农耕民族固有的特点,他们与世隔绝,聚族而居。从野蛮转换到文明之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产生于建国于中州的商代后期。《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武王克商后,周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西周建立后,统治者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和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战国和秦代,血缘宗法制度和观念曾受到过较大的冲击,但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改朝换代的战争,常常困扰着中国的历史,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战国的动荡,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有所冲击,但超姓氏的家族本身却依然在发展。到了汉代,由于较长时间的和平安定,一些强宗豪右、世家大族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广占良田,形成一个个宗族色彩十分浓烈、封建自然经济经营方式的地主庄园。另外,他们为了保住世家的特权,在家族教育、文化传承方面也越来越倍加重视。文化世家相继涌现,各具特色的世家文化也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频繁,但家族制度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州门阀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主体,随着中原政权的南移,世家文化开始向祖国的南方辐射。豪门和寒门的严格区分,使一些豪门大族特别重视家谱和

族谱的编写,以致编纂家谱成为专门学问。封建统治者充分利用家族和家族文化来为巩固政权服务,他们把政权与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特别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制演化而来的族权,不仅成为政权的补充,还起到了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作用。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族制度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灭亡,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也没多少衰亡的气象。正像梁启超先生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这种宗法制度的政治社会结构,使世家大族的形成和文化世家的出现准备了社会政治基础。

中州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州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或者可称之为中国的核心文化。早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左右,“南召人”就生活在这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形成了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系列。裴里岗文化距今约有 8000 多年的历史,其时已经进入农业耕作阶段;而至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文字、城堡和青铜器,这标志着中州文明时代的到来。夏、商、周三代是中州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就建立在豫西的河洛地区,传说中的夏禹就诞生在这里。此后的商部族又崛起于豫东的商丘,建国后虽然经过数次迁都,但基本上都是在河南境内。西周虽然建都镐京,但洛邑为其陪都。东周迁都洛阳,使中州又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直到战国,这里出现了第一个文化繁荣时期。以儒学为首的诸子百家之学群起争鸣,孔子祖籍是宋(今商丘)人,其学虽然兴起于邹鲁,孔门弟子多为齐鲁、中州士人,漆雕开为蔡人,高柴、端木赐、卜商为卫人,原宪、司马耕为宋人,颛孙师、公良儒是陈人,可见儒家的重心在今山东、河南一带。法家

的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都是河南人。道家创始人老子为苦(今河南鹿邑)人,庄周为宋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及后学宋研皆为居鲁的宋人。学富五车的名家学派的代表惠施也是宋人。纵横家的代表苏秦、苏代兄弟则是洛阳人。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是在中州。秦汉时期,这里的文化虽东不及齐鲁,西不及关中,但随着政治重心的东迁,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文化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如西汉的张苍、贾谊、晁错、桑弘羊、虞初、桓宽、褚少孙等,东汉杜诗、许慎、许劭、张衡、陈寔、服虔、应劭、蔡邕、张仲景等,在各个文化层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中州文化的发展缓慢,但在当时仍是黄河流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魏书·儒林传》载,北魏孝文帝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南人陈庆之出使北魏回来后对人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丰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为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这些记载仅指南北朝时期建都于中州的北朝,魏和西晋时期上承东汉丰厚的文化积淀,人才辈出。三国时魏有书法家钟繇,谋士荀攸、荀彧、郭嘉,玄学家王弼、何晏,文学家阮瑀、阮籍等。西晋的竹林七贤四位是中州人,荀勖、潘岳、司马彪、郭象等都是文化界的代表。东晋至南朝的文坛也多是由中州迁徙南来的文人主宰,如谢灵运、谢朓、江淹、范缜、范晔、钟嵘等,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是一流名家。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州文化的又一繁盛时期。哲学家有姚崇、刘禹锡,著名诗人有上官仪、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岑参、崔颢、杜甫、元稹、元结、李贺、李商隐等,散文家有“文起八代衰”的韩愈,史学家有李延寿、朱敬则、吴兢、司马贞,书画家有